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New Histor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貳 軍事作戰

On the Battlefield

國史館

第5章 初期重要戦役

第一節　前言

一、戰爭的分期

中國抗日戰爭自 1937 年 7 月 7 日始，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止，前後歷時八年一個月又七天。1946 年抗戰勝利之初，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編印《八年抗戰之經過》，將抗戰區分為一、二兩期。[1] 這樣的分期方式，與戰爭時所出版之戰史相一致，[2] 並為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纂之《抗日戰史》、《陳誠回憶錄》等著作所沿用。[3]

第一期作戰又稱守勢時期，時間自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起，至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漢撤守為止。此時國軍之戰略為力保要地，使日軍疲憊，粉碎其速戰速決之企圖。國軍以一部集中華北，於平綏、平漢、津浦沿線各要點，重疊配備，多線設防，逐次抵抗，特注意確保山西之天然堡壘；同時，主力集中華東，攻擊上海日軍，力保淞滬要地，掩護首都南京。迨 1937 年末南京失守，國軍於津浦路與日軍對陣，爭取時間，俾主力於武漢外圍積極整備，恢復戰力。[4]

第一期作戰，可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1937 年 7 月上旬至同年 12 月中旬，即盧溝橋事變爆發至南京失陷；第二階段，自 1937 年 12 月下旬至 1938 年 6 月上旬，即南京失陷至徐州會戰結束；第三階段，自 1938 年 6 月上旬至同年 10 月下旬，即徐州會戰後至武漢會戰結束。[5]

---

1 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46 年），頁 27。
2 如何應欽，《五年來之抗戰經過》（重慶：勝利出版社，1942 年）。
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一）－（五）》（臺北：1982 年再版）；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 年），頁 25-26。
4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 年第 3 版），頁 27。
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一）－（五）》。

第二期作戰又稱持久戰時期，自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漢撤守起，迄於 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國勝利為止。此時期國軍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擊及反擊，消耗日軍，策應敵後游擊戰，壓迫日本占領區，迫使日軍困守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及物資剝奪。同時抽集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施行反攻。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與盟軍並肩作戰，派遣軍隊進入緬甸，協助盟軍作戰，打通中印公路，獲得必要之裝備，整建新軍，增強戰力。迄 1945 年初夏，美械部隊大部整建完成，配合太平洋方面盟軍之海上攻擊，先後收復桂、柳，肅清廣西日軍，同時準備進攻雷州半島，收復廣州，開放廣東海口，以奠立第三期反攻作戰之基礎。惟第三期未及實施而日本已降，此期作戰遂為全面受降所替代。[6]

第二期作戰，亦可細劃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 1938 年 11 月起至 1940 年 4 月下旬止，即武漢會戰結束後至 1939 年國軍冬季攻勢結束；第二階段，自 1940 年 5 月上旬，至 1941 年 12 月上旬，即 1939 年冬季攻勢結束後至珍珠港事變爆發；第三階段，自 1942 年元月起，至 1945 年 8 月中旬，即珍珠港事變爆發迄中國最後勝利。[7]

抗戰時國軍重要將領陳誠指出，二期抗戰各有其截然不同之特點，區別甚大，未可混為一談。就戰術言，第一期抗戰，中方「以戰為守」，日方「速戰速決」；第二期抗戰，中方「以守為戰」，日方「以戰養戰」。就地形言，第一期抗戰多為平原戰，利於日軍而不利於國軍；第二期抗戰，國軍已轉入山地，利於國軍而不利於日軍。就國際關係來說，第一期抗戰，國際關係混亂，利於日方而不利於中方；第二期抗戰，國際關係逐漸分明，迨中國加入盟軍，遂立於不敗之地。[8]

將整體作戰經過區分為二期，與抗戰時軍事當局之作戰構想

---

6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7-28。

7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一）－（五）》。

8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25-26。

一致，然而，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抗戰與世界戰局匯流，總體情勢有較大的變化，故亦有將珍珠港事件後另行劃分階段者。三階段之劃分，較早且影響力較大之著作，為 1978 年蔣緯國奉蔣中正指示總編之《抗日禦侮》十卷，其後，1994 年國防部審訂並發行之《國民革命戰役史第四部——抗日》，亦將抗日戰爭區分為三階段：「初期戰役」自 1937 年七七事變起，至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漢會戰結束止，與二階段劃分之「第一期抗戰」相同。武漢會戰後至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為「中期戰役」，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為「後期戰役」，此中、後期戰役，相當於上述之「第二期抗戰」。[9]

本文採用三期劃分，將整體抗戰區分為初期、中期、後期。以武漢會戰結束劃分初、中期，大抵如何應欽、陳誠之區畫。復以珍珠港事變為界，區分為中、後期，此乃因是時中日戰爭擴大為太平洋戰爭，與世界大戰合流，中國加入同盟國，和美、英等列強協同作戰。同時，日本方面，改以太平洋戰場為主戰區，中國為其支戰區，對中國採取戰略守勢。[10] 亦即，中日整體戰略在珍珠港事變後，發生重大變化，有再做分期之必要。[11]

二、雙方戰力比較

全面戰爭爆發前，中、日兩國國力差距十分懸殊，中國雖在國土面積、人口總數高於日本，但在工業生產、軍事力量等方面則遠無法比擬。就兵力而論，雖中國人口大大超越日本，然日本

---

9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一）概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 年），頁 3-5。

10 蔣緯國總編，《答抗日禦侮戰史讀者問》（臺北：黎明出版文化公司，1978 年），頁 18-19。

11 中共的抗戰分期，大抵依毛澤東 1938 年所撰之〈論持久戰〉，該文認為抗戰應經歷「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階段。參閱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頁 2-4。

開戰之初，陸、海、空軍（空軍隸屬於陸、海軍）無論在質量或數量上均占絕對優勢，其原因係已實行徵兵制數十年，不但在鄉兵員甚多，且訓練有素，又軍工業發達，裝備優良。[12]

日本實行徵兵制度，凡年滿 17 歲至 40 歲之男子，均有服兵役之義務，其可動員之人力為 2,780 餘萬人。現役兵員雖僅 38 萬人，但合預備役（738,000 人）及後備役（879,000 人）則為 200 萬人；第一、二補充兵（1,579,000 人、905,000 人）約為 240 萬人，合計 440 萬人。[13]

中國兵役制度尚屬初創，1933 年始公布「兵役法」，然因募兵制度行之已久，為顧慮事實，未能盡廢。1936 年 3 月，明令實施兵役法，實則仍採徵、募併行辦法。但實行未久，抗戰爆發，故中國兵役制度及人力動員，均不足以應付戰爭需求。抗戰時，兵役制度雖隨時改進，兵員補充仍捉襟見肘，計八年間，動員兵員約 1,220 餘萬人，以當時人口 4 億 6,700 餘萬計，動員率約為 2.6%；相較日本 9,000 餘萬人口（加計朝鮮、臺灣等殖民地），可動員人力 2,780 餘萬人，動員率可達 30.8%。中國陸軍現役兵 170 餘萬人，補充兵約 50 萬人，雖有 182 個師之番號，但作戰初期可使用於第一線之兵力，僅為步兵 80 個師、9 個獨立旅、9 個騎兵師、2 個砲兵旅又 16 個獨立團。海軍方面，總噸位 11 萬，相較於日軍之 190 餘萬噸，尚不及十分之一。空軍方面，僅有戰鬥機 305 架，合各式飛機共約 600 架，日機則有 2,700 餘架（表 1）。[14]

---

12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23；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5-16。

1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5-16。

1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6-17。

表 1　戰前中日軍事力量比較表

區分	日本	中國	比率
陸軍	常備兵員 38 萬人	現役兵 170 餘萬人	1：4.5
	動員後可達 440 萬人	補充兵 50 萬人	
空軍	約 2,700 架飛機	約 600 架	4.5：1
海軍	總噸位 190 萬	總噸位 11 萬	17：1

就編制裝備比較，日本戰前輕重工業均已相當發達，軍備充實，且能適應戰機，隨時裝備特種部隊。戰爭初期，日軍的常設師團（甲師團），包括 4 個聯隊（四單位師團），兵力約 25,000 人；另有特設師團（預備師團、乙師團），為戰時動員編成，人員數目與常設師團相同，但戰鬥力、兵站部門較弱。1939 年以後，編有治安師團（警衛師團、丙師團），由 3 個聯隊組成（三單位師團），兵力較少，約 14,000 人左右，機動力較弱。[15]

國軍於戰前不斷進行整編，有調整師與整理師之編制。調整師係衡量現代作戰之需求與裝備，為調整施行容易而統一擬訂的一種甲種編制，其性質同各國之常備師。整理師係顧慮中央財力及裝備數量，於調整師外另訂一種編制，使其組織、薪餉劃一。至 1937 年 6 月，中央直轄部隊計編成調整師 35、整理師 24；地方軍系方面，東北軍調整 10 個師，廣東部隊整理 10 個師，川、康部隊整理 26 個師及 9 個獨立旅。調整師為國軍編裝最優良者，但與日本師團相較，戰力差距仍大，尤以重武器短少，不足以組成戰略單位之火力（表 2）。最大弱點尤為多數編制員額未盡充實，如滿額調整師約 1 萬 1 千人，淞滬開戰前，中央軍平均 1 個師僅 8

15 户部良一著，趙星花譯，〈華中日軍：1938~1941——以第 11 軍的作戰為中心〉，楊天石、臧運祐編，《戰略與歷次戰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262；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年第 2 版），頁 736、740。

千餘人，其中 7 千多人是戰鬥兵。[16]

表 2　中國調整師與日本師團編制裝備比較表

編制比較							
兵種	步兵	砲兵	騎兵	工兵	輜重兵	戰車	其他
日軍	旅 2（團 4）	團 1	團 1	團 1	團 1	連 1	特種部隊若干
國軍	旅 2（團 4）	營 1		營 1	營 1		特種部隊若干

裝備比較												
類別	人員	馬匹	步騎手槍	擲彈筒	輕機槍	重機槍	榴(山)砲	團營砲	戰車	車輛	自動貨車	一馬曳車
日軍	21,945	5,849	9,476	576	541	104	64	44	24	262	266	555
國軍	10,923		3,821	243	274	54	16	30				
備考										係日軍砲兵團之配備	全屬日軍輜重兵團裝備	全屬日軍輜重兵團裝備

說　　明：一、表內國軍以 1937 年調整師爲準。

二、日軍編裝與實際或有出入。

資料來源：依據陳誠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南京：國防部，1946 年），附表第三：戰爭直前敵我師編制裝備比較表。

就編裝來看，中、日兩軍戰力約為 4 比 1。[17] 若以火砲力量做比較，假定日本甲師團戰力數值為 100，則乙師團為 62，丙師團為 44，國軍為 16（蘇聯軍隊為 111）。依此比例，日軍 1 個聯隊

16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一）概論》，頁 264-267。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7。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頁 236。

17 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一）概論》，頁 273。

可以對抗國軍中央直系軍的 1 個師；1 個大隊（700-800 人）可以對抗國軍地方軍 1 個師；進行攻擊任務只需 1 個大隊，防禦任務則只需 1 個中隊。[18] 實際作戰，受部隊協同、海空支援、戰術水準、人員素質等影響，國軍需 2 至 3 個軍（約 6 至 9 個師）方能與日軍 1 個師團相抗，[19] 武漢會戰後，蔣中正便說到：「我之兵員數量大過於敵，我軍各期作戰之初，第一線軍隊幾大於敵軍二、三倍，約以三師人數抵敵一師；若就全局而言，我軍往往以八師或十餘師人數與敵軍一師對戰，然尚不能戰勝敵軍。」[20]

就軍需工業比較，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對輕重工業之建設，不遺餘力。戰爭發動之時，已有金屬工業工廠 6,600 餘所，機器工業工廠 9,000 餘所，化學工業工廠 4,300 餘所，軍用資料製造廠 34 所。其所有戰爭武器，如飛機、戰車、火砲、船艦、車輛及化學兵器等，均能自造，且民用工業發達，戰時可改裝從事軍需生產，雖國內資源貧乏，然可由中國東北攫取或自世界各國輸入。中國則科學落後，工業基礎脆弱，軍需工業設備簡陋，技工缺乏，且受限於財力，無法大舉擴充，致重武器多不能自造（表 3）。[21]

---

18 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頁 740。户部良一著，趙星花譯，〈華中日軍：1938~1941——以第 11 軍的作戰為中心〉，頁 262。

1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再版），頁 5。

20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以下簡稱《事略稿本》），第 42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554-555。

2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17。

表 3　戰前中日兩國國力比較表

	中國	日本	比率
國土面積	11,418,174 km^2	369,661 km^2	31：1.0
人口總數	467,100,000 人	90,900,900 人	5：1.1
工業總產值	13.6 億美元	60 億美元	1：4.4
鋼鐵年產量	4 萬噸	580 萬噸	1：145
煤年產量	2,800 萬噸（其中外資企業占 55%）	5,070 萬噸	1：1.9
石油年產量	1.31 萬噸	169 萬噸	1：129
飛機年產量	0 架	1,580 架	
大口徑火砲年產量	0 門	744 門	
戰車年產量	0 輛	330 輛	
汽車年產量	0 輛	9,500 輛	
年造船能力	不詳	47.32 萬噸	
年造艦能力	0 噸	52,422 噸	

說　　明：日本人口總數欄爲加上朝鮮、臺灣等殖民地之數字，單計日本爲 7,000 餘萬人。

資料來源：依據劉庭華編，《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繫年要錄．統計薈萃》（北京：海軍出版社，1988 年），頁 475-476。

第二節　戰爭爆發與華北諸戰役

一、盧溝橋事變及平津戰役

國軍在抗戰爆發之前，早已積極備戰，然鑒於中日戰力之差距，未到最後關頭，並不輕易開戰。1935 年 11 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報告「對外關係」，宣示：「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

到最後關頭，亦絕不輕言犧牲。」1936 年 7 月，蔣在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對這兩句話再做解釋，指出所謂最後犧牲的時刻，即「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如遇有領土主權再被人侵害，如果用盡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這個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們國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這就是為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22]

1936 年 10 月，因日軍、蒙古軍在綏遠用兵，蔣中正電召陳誠至廬山，陳其後隨節進駐洛陽策劃抗日大計，策定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戰略。陳誠認為，日軍入侵利於由北向南打，而國軍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於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要之，國軍作戰的最高原則，為以犧牲爭取空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23]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前，日軍對華作戰計畫為由華北、華中（東）、華南向中國發動局部作戰，占領要地，使中方不得不向日本屈服。華北方面，計劃占領北平及天津等地，另由陸軍與海軍協同，在山東半島及海州附近登陸，占領青島、濟南、海州附近要地。華中（東）方面，陸軍在海軍協同下，於上海、長江下游地區登陸，占領上海附近地區。華南則占領福州、廈門等地。[24]

盧溝橋為橫跨於永定河上的一道石造巨橋，因永定河別名盧溝，故名盧溝橋，俗稱蘆溝橋。該橋建於金朝（1187 年），明代（1444 年）重修，地屬宛平縣，東北距北平約 15 公里，當豐臺與長辛店之間。豐臺是平漢、平綏、北寧三條鐵路的交會之地，長辛店是平漢路北段要鎮，皆為軍事上兵家必爭之地；日軍若占領盧溝橋，北平即陷孤立。1937 年 7 月 7 日夜間，日軍在盧溝橋舉行演習，藉口一名士兵失蹤，於深夜要求進入鄰近之宛平縣城搜

2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22。
23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23。
2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 年），頁 368-369、413。

查，守軍不允，日軍即以步砲兵力突擊宛平，守軍當即還擊，是為「盧溝橋事變」。[25]

在盧溝橋挑起事變的日軍，為華北駐屯軍（日文「支那駐屯軍」），該軍依八國聯軍之役（1900 年）後清廷戰敗簽訂之辛丑和約（1901 年）而設，和約寫明為「保護使館」與「維護自京師至海通道之安全」，承諾外軍駐華之權利。民國成立之後，西方列強駐軍大幅減少，日軍則反之，不斷擴充編制與增兵，形成長城以外（北）事務歸關東軍，長城以內（南）事務歸華北駐屯軍。[26]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其編制有軍司令部 1 個、步兵旅團司令部 1 個、步兵聯隊 2 個，另有戰車隊、騎兵隊、砲兵聯隊、工兵隊等，兵力約 5,774 人。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旅團長為河邊正三少將。[27]

當時中國河北軍政負責人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其所部分駐於冀察及平漢線北段。事變發生後，蔣中正電告宋和北平市市長秦德純，以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就地抵抗。9 日，蔣再電宋哲元「和談勿忘備戰」，並下令在四川的軍政部長何應欽立即馳赴南京，著手編組部隊，準備全面抗戰，另指示在廬山軍官訓練團的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8 月上旬改編為第一軍團）孫連仲火速下山，率領國軍 2 個師鐵路運輸北上河北保定、石家莊。此外，調動山西太原、運城方面之部隊，

---

25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年），頁 1-2、292-324。李書對盧溝橋事件「第一槍」的問題，有充分的考證，並認為日軍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已在中國領土射擊過不知多少「第一槍」，日本本身行動已是非法、侵略，盧溝橋事件時有沒有「第一槍」，已無關緊要。

26 李雲漢，《盧溝橋事變》，頁 195-207。

2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 37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部，《戦史叢書：陸軍軍戦備》（東京：朝雲新聞社，1979 年），頁 169。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9 年），頁 71-72。

向石家莊集結，並令各軍事機關準備總動員，加強各地戒備。[28]

7 月 13 日，蔣再電宋，告以中央決心全力抵抗，勉其處處固守，時時嚴防，勿為敵人所欺，並告以「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勿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然宋哲元部源自馮玉祥之西北軍，有其一貫發展歷史，對中央仍有隔閡，懷疑中央是否有對日作戰決心，且其駐地在中央軍及日軍之間，中日開戰，勢必造成該部重大損失，故宋哲元猶疑不決，向中央表示：「要抗戰，沒有錢，沒有軍火。」拒絕中央派遣軍隊協同作戰。[29]

日本陸軍中央，因首長領導力不足，核心參謀人員掌控軍事決策大權。對於盧溝橋事變的衝突，核心參謀人員多主張即使要擴大事件，作戰範圍仍應限定在華北地區。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力主事件不擴大方針，但中國中央軍的北上，牽動其派兵態度，加以陸軍內部瀰漫「對中國一擊論」，擴大派的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參謀本部作戰部作戰課長武藤章持強硬立場，認為只要打擊中國軍，國民政府便會屈服。因此，日本於 7 月 27 日通過 3 個師團的派遣。[30]

7 月 26 日，日機轟炸廊坊，另一部強行進入北平廣安門，為國軍拒止，日軍乃致牒宋哲元要求第二十九軍撤退駐北平城郊部隊於永定河以西。宋此時知委曲不能求全，嚴詞拒絕，下令所部準備應戰，並懇請中央運抵華北之軍隊推進至北平支援，惟部署失時，防禦工事欠缺。27 日，日軍圍攻通縣國軍，國軍駐軍 1 營

---

28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0、47；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43。

29 李君山，〈一九三五年「華北自治運動」與中國派系之爭——由《蔣中正總統檔案》探討戰前中日關係之複雜性〉，《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頁 195-246；何智霖，〈中原大戰後期宋哲元動向之探討——兼論入晉西北軍之整編〉，《國史館館刊》，第 28 期（2011 年 6 月），頁 1-30；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43、51。

30 波多野澄雄著，户張敬介譯，〈日本陸軍內部的戰略決定〉，楊天石、臧運祐編，《戰略與歷次戰役》，頁 103-109。森靖夫，《日本陸軍と日中戰爭への道》（京都：ミネルヴぁ書房，2010 年），頁 174-176。

突圍退守南苑，同日，日機轟炸平郊駐軍，並偵察開封、鄭州、洛陽等地。28 日，日軍向北平駐軍總攻擊，一部向北苑，主力向南苑圍攻，復以飛機數十架輪番轟炸。國軍抵抗無效，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在南苑駐地陣亡，駐北苑之河北保安隊傷亡亦眾。是夜，宋哲元率第二十九軍主力向永定河右岸撤退，留天津市長張自忠於北平代理冀察政務，並命劉汝明留守北平，北平隨即失陷。29 日拂曉，日軍第五師團及海軍分向天津及大沽口攻擊，當夜，該地國軍奉張自忠命令撤退。30 日，日軍攻陷天津。中國北方兩大重要城市，遂皆告淪陷。[31]

蔣中正為平、津失陷，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明示「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舉國一致，不惜犧牲來和倭寇死拚」。[32] 亦即，最後關頭已然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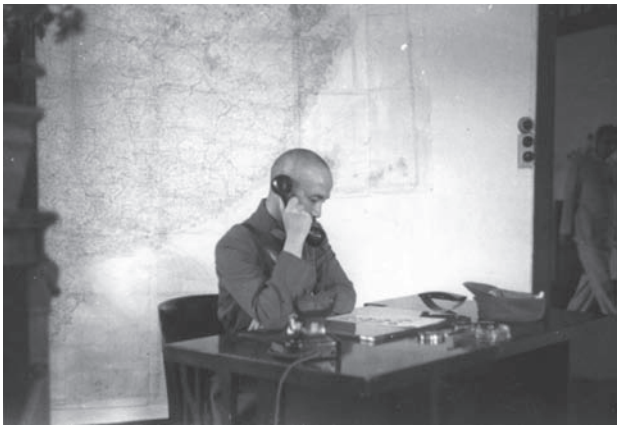

圖 1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處理軍務留影（國史館提供）

31 《蔣中正日記》，民國 26 年 7 月 27、28 日，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43；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47-48；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 456-459。

32 蔣中正，〈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一）〉（民國 26 年 7 月 31 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頁 217-221。

二、平綏、平漢、津浦線諸戰役

日本自日俄戰爭以後，即以蘇俄為重要假想敵，加強對蘇備戰，惟至盧溝橋事變前，日本與蘇聯遠東軍兵力比益形懸殊，蘇聯握有強大優勢，故日軍對動員兵力使用於中國方面如履薄冰，希望速戰速決，予中國一擊使之屈服，儘快結束戰爭。8 月 31 日，日本廢止華北駐屯軍，重新組成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以寺內壽一大將為司令官，下轄第一軍（香月清司中將，轄第六、第十四、第二十師團）、第二軍（西尾壽造中將，轄第十、第十六、第一〇八師團），直轄第五、第一〇九師團、中國駐屯混成旅團等部，總計 8 個師團。[33]

日軍在華北的作戰，以平津為中心，沿平漢、津浦、平綏等主要交通線多向出擊。第一軍沿平漢線南下，為主決戰方向，攻擊保定、石家莊等地，欲捕捉殲滅國軍主力；第二軍沿津浦線南進，指向滄州；第五師團配合關東軍一部，沿平綏線前進，進攻察哈爾、綏遠及山西北部等地。[34]

平綏線方面，先是 8 月 1 日，蔣中正任命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為第七集團軍總司令（由第十九軍、第三十五軍、第六十一軍各一部組成，另直轄 1 師又 3 旅），湯恩伯為前敵總指揮（轄第十三軍、第十七軍），率部由綏遠、山西向察哈爾增援；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為副總司令（轄第一四三師及 2 個保安旅），任察境之守備。國軍以湯恩伯指揮之 2 個師扼守南口，原駐石家莊的衛立煌一部亦馳往增援。湯部死守南口多日，衛軍輕裝急援，因道路崎嶇，前進遲滯，南口未獲援軍，遂於 25 日失守，惟湯仍

---

3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289-293；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 459-462；徐勇，《征服之夢——日本侵華戰略》（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46-147；波多野澄雄著，户張敬介譯，〈日本陸軍內部的戰略決定〉，頁 110-111。

34 徐勇，《征服之夢——日本侵華戰略》，頁 147-148。

獲令譽，蔣中正讚其為「罕世之名將」。[35]

駐張家口之國軍，原擬協同他軍會攻張北，因連絡不確，行動未合機宜，日軍遂分頭南下，進攻張家口，國軍退守，兵力呈分離態勢，日軍乃於 27 日攻陷之。[36]

平漢線方面，8 月初，國軍設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石家莊行營（旋改為保定行營），以徐永昌為行營主任，統轄華北戰事，並分任宋哲元、劉峙為第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負津浦、平漢路北段作戰指揮之責。[37]

8 月 20 日，國民政府劃分出五個戰區，河北省及豫北為第一戰區，蔣中正兼任司令長官，統一指揮津浦、平漢兩路北段作戰，隨即頒發作戰計畫，方針為「阻止敵沿津浦、平漢鐵路南下，並側擊進攻南口之敵」。21 日起，日軍沿平漢路南下，國軍孫連仲部與日軍激戰，作戰不利，後撤至馬頭鎮、琉璃河之線。此時日軍已攻下南口，抽調部隊增援，擊破國軍陣地。9 月 18 日，日軍跟蹤追至涿州，國軍各部部署未竣，該城遂為日軍攻占。劉峙令第五十二軍關麟徵部加強保定北面既設陣地，拒止日軍南下，惟防守正面過廣，兵力不敷使用，以致部隊收容未畢，日軍即跟蹤而至。20 日，國軍前進陣地遭突破，在日機與砲火轟擊之下，工事多被摧毀，24 日，保定失守。保定戰役，國軍雖失地甚多，損傷極重，但主力未遭日軍捕捉殲滅，日軍並未達成作戰目標。[38]

10 月，日本參謀本部調整華北作戰目的，從殲滅河北省中部國軍，改為確保占領地區的穩定。但華北方面軍不受約束，打破

---

35 《蔣中正日記》，民國 26 年 8 月 26 日。

36 何應欽，《五年來抗戰之經過》（重慶：勝利出版社，1942 年），頁 3-4；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43。

37 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第 3 卷（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87 年再版），頁 96。

38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50-52；劉峙，《我的回憶》（臺北：文海出版社，1982 年），頁 143-149；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43、45；波多野澄雄著，户張敬介譯，〈日本陸軍內部的戰略決定〉，頁 111。

原先的限制線，繼續南下進攻。[39] 國軍在保定失守後，平漢線方面由劉峙改任程潛指揮，適值晉北告急，除衛立煌之 3 個師馳赴晉北增援，另調孫連仲、郝夢齡、曾萬鍾、馮欽哉、劉茂恩等部轉用山西，分守娘子關及忻口要隘，宋哲元部又調往津浦線方面作戰，平漢線國軍兵力薄弱，日軍乘機分三路渡滹沱河，國軍三面受敵，終至不能抵抗，而於 10 月 10 日退出石家莊。[40]

日軍於攻陷石家莊後，即將部分軍隊轉用於進攻晉東娘子關，其餘部隊仍沿平漢線南下。時國軍平漢線軍隊多已劃歸山西方面作戰，現有兵力不足，日軍乘國軍立足未穩，分兩路進擊，主力由鐵道南下。河北平地無險可守，國軍又兵力單薄，日軍進擊順利，連下平漢線上的內邱、邢臺、邯鄲、磁縣、安陽、大名等地。斯時日本華北方面軍先以主力進攻山西，11 月 9 日攻占太原後，轉用一部於上海，故對平漢線暫取守勢，在平漢線之漳河及衛河北岸構築工事，與國軍對峙。[41]

津浦線方面，8 月中旬，日軍為打通滄石線（滄縣 —— 石家莊），令第二軍磯谷廉介中將之第十師團沿津浦線東側、中島今朝吾中將之第十六師團沿津浦線西側南下。9 月 10 日，日軍第十師團突破國軍馬廠正面陣地後，21 日開始向姚官屯陣地攻擊，激戰四晝夜，日軍以其優勢砲火摧毀國軍陣地，國軍鐵路附近之陣地遂被突破，全線撤退，日軍攻取滄縣。

日軍據有滄縣後，繼續進攻，國軍預定退守碱河南岸之計畫，因日軍追迫甚猛，未能確實占領陣地，繼而向南皮方面撤退。9 月 29 日，國軍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令副司令長官鹿鍾麟親赴南皮，督率各軍夾擊日軍，次日夜半，各部開始襲擊泊頭鎮等地，但以通信困難，與正面友軍無確切之聯絡，襲擊未能奏效，各部遂向德縣以東地域撤退。國軍調第三集團軍韓復榘部之 2 個師增

---

39 波多野澄雄著，户張敬介譯，〈日本陸軍內部的戰略決定〉，頁 111。
40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52。
41 何應欽，《五年來抗戰之經過》，頁 7-9。

援，惟增援不利，10 月 5 日，日軍攻下德縣。國軍即沿老黃河右岸布防，並以一部在黃河南岸構築工事，中日對峙約一星期。12 日，日軍偷渡老黃河向國軍平原以北陣地攻擊，韓復榘部撤至徒駭河南岸與日軍對峙，此時華北日軍正以全力攻略山西，轉用其第十六師團於平漢線方面。中國統帥部以山西軍事吃緊，津浦路上日軍兵力薄弱，令韓復榘部以主力攻擊德縣，進出滄縣，牽制日軍；但韓遲疑觀望，推進遲緩，此計未售。[42]

三、太原會戰（忻口會戰）

日軍攻下南口、張家口後，續向山西東北進攻，國軍向平型關、雁門關等長城一線撤退，期與晉軍主力會合後與日軍決戰。日本關東軍主力自攻取察哈爾省後，即分向晉北進攻，企圖與山西東北第五師團主力兩翼夾擊。

9 月中旬以後，國軍於平型關附近集中 15 萬人左右，組織平型關戰役，防阻日軍第五師團等部約 3 萬餘人之進攻。時中共的第十八集團軍歸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配合戰區指令，從日軍側背進行包抄作戰，偶然發現日軍汽車隊及輜重隊進入部隊作戰範圍，原本旨在圍殲向平型關進攻的日軍主力之作戰，遂轉為殲滅日軍補給部隊之伏擊戰。9 月 25 日上午 9 時半左右，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一五師林彪部第六八五、第六八六團約 4,000 人左右，對日本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經過平型關附近小寨村的汽車隊、經過蔡家峪的輜重隊，及老爺廟之一部發動伏擊，並與輜重隊後衛部隊與增援部隊進行戰鬥。戰鬥至下午 3 時半，殲滅日軍數百人，毀壞、繳獲許多物資、車輛。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接獲前線報告後，為振奮人心誇大宣傳，聲稱擊潰日軍萬餘「屍橫山野」、

42 何應欽，《五年來抗戰之經過》，頁 14-17；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45、51。

繳獲車輛槍砲甚多。此一平型關戰鬥，乃被稱為「平型關大捷」。[43]

平型關戰鬥對日軍前進影響不大。時日本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之一部由北往南向內長城線進攻，策應第五師團之作戰。29日突破茹越口，繼而攻下繁峙，威脅平型關國軍之後方。平型關國軍分兵馳援不及，於30日之夜向五臺山、代縣之線撤退。[44]

日軍原先本著不擴大方針，令山西前線之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占領大同附近要地，確保作戰地域內察哈爾之安全，第五師團則應準備保定方面。然第五師團獨斷向山西省內長城線進攻，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主力亦逐次參加作戰，陸軍中央均予事後追認。[45]

國軍為確保山西要地，轉用平漢線兵力，10月2日命第十四集團軍衛立煌部統率4個半師連夜由石家莊向太原以北地區集中，並以晉軍堅守崞縣、原平，爭取時間。至10日，崞縣、原平先後失守，此時衛立煌部大半已集中忻口及其以西地區，會合晉軍，防守忻口陣地。12日，日本第五師團及關東軍第一、第十二師團等部，以中央突破戰法攻擊忻口陣地之南懷化高地，中日展開忻口會戰。會戰自13日開啟，至18日，國軍陣線穩固，迭次出擊，日軍傷亡甚多，國軍造成華北戰役最有利之戰局。[46]日軍久攻不下，使用火焰噴射器配合大口徑迫擊砲，拋射濃縮汽油彈，向國軍猛攻。中國守兵被濺到濃縮汽油，除自行滾轉外，無法加以救護；陣地存儲之彈藥，亦引起爆炸，損失甚重，軍長郝夢齡中將、師長劉家麒少將，均於是役陣亡。迄11月初，國軍受晉東不利之影響，背後連絡線有被截斷之虞，遂向後方太原附近撤退。[47]

---

43 楊奎松，〈關於平型關戰鬥的史實重建問題〉，《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1期上，頁21-50。

44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56。

45 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第3卷，頁98。

46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57。

47 陳長捷，〈忻口戰役追記〉，《正面戰場．晉綏抗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頁83-88；何應欽，《五年來

先是，平漢線日軍於 10 月 10 日攻占石家莊後，以一部沿鐵路繼續南下，主力第二十師團則沿正太路西進晉東，圖以外線作戰之態勢，策應其晉北部隊會攻太原。國軍為確保晉東，將平漢路第二集團軍孫連仲等部轉移於太行山隘路、娘子關南北之線，扼守正太路阻止日軍西進。22 日，日軍轉用平漢線第十四師團，以一部向娘子關正面施行牽制攻擊，以主力由橫口車站（井陘東）向南漳城、魚鎮前進，企圖包圍國軍側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以後方危險，遂將正面之孫連仲部轉移於後方平定方面，並將預定增援晉北之第二十集團軍商震部調至晉東，因兩方顧慮，致部隊抽調未合機宜，日軍遂於 26 日攻克娘子關，續向平定攻擊。國軍擬以第十八集團軍朱德部由平定西南山地向日軍側擊，不期平定南方之晉陽發現日軍西進，此計畫遂不能如期實施。自此指揮失序，各部分離，正太路上的陽泉、壽陽相繼陷落，太原危急，晉北忻口戰鬥有利之陣線為之動搖。[48]

晉東日軍向西進迫太原之際，閻錫山令忻口守軍向太原以北青龍橋既設陣地轉移，與晉東國軍協力防守太原外圍，並令第七集團軍傅作義部守備太原城。忻口各部於 11 月 2 日夜開始移動，嗣以日機猛炸及機械化部隊跟蹤追擊，未能立足，乃轉移陣地於太原北郊，終以東山失守，受敵瞰制，乃渡汾河西撤。晉東國軍到達太原城南時，由於日軍已對太原形成包圍，故分路南移西渡。11 月 6 日，晉北日軍向太原城郊進攻，7 日，晉北、晉東日軍會合，續向太原進擊。8 日入夜，日軍一部由北城突入，守城國軍突圍，日軍遂攻陷山西重鎮太原。其後，日軍沿同蒲部南進，擊退國軍由安陽來援之湯恩伯第十三軍先頭部隊，攻下祁縣、平遙後停止，太原會戰乃告結束。[49]

抗戰之經過》，頁 12。

48 何應欽，《五年來抗戰之經過》，頁 12-13。

49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59-60；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43。

太原會戰及山西周圍之戰役，皆以日軍戰勝告終，但日方亦付出相當代價。日軍軍馬屍體散布之屍臭，在裝甲車中也可長時間聞到；[50] 單就日軍主力第五師團來看，在各戰役中傷亡達 7,000 餘人。[51] 國軍投入約 28 萬人，傷亡逾 12 萬人，極其慘烈。[52]

第三節　淞滬會戰

中日於華北開戰後，在上海亦劍拔弩張。中國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主張在上海主動發動攻擊，迭次向統帥部提出建議。統帥部同意先發制敵之主張，但時機應待命令。[53] 此後，國軍不斷加強淞滬防備。8 月 9 日下午 5 時許，日本海軍陸戰隊軍官大山勇夫率兵 1 名，乘車衝入虹橋機場，為中國航空委員會特務團第八連衛兵阻止，大山即開槍射擊，擊斃中方衛兵，其他衛兵因之還擊，擊斃大山及其隨帶士兵。[54] 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後，中日雙方舉行談判，日方要求中方撤退上海保安隊，並拆除所有保安隊之防禦工

---

50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東京：芙蓉書房，1978 年），頁 140。

51 外山操、森松俊夫編，《帝国陸軍編制総覧》（東京：芙蓉書房，1987 年），頁 506。

5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太原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再版），第四篇第九章第二節插表第四。日軍為激勵士氣，對傷亡人數傾向少報，國軍則偏向誇大敵我傷亡數字以顯示戰事之慘烈。一來一往，數據差距甚大。薩蘇，〈七十萬魂不還鄉——日方史料中日軍在中國陣亡人數〉，薩蘇，《國破山河在——從日本史料揭密中國抗戰》（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年），頁 147-149。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246。

53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頁 117。

54 「張治中呈蔣中正何應欽等電」（民國 26 年 8 月 9 日），〈盧溝禦侮（一）〉，特交文電，《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1-193。「張治中呈蔣中正等電」（民國 26 年 8 月 10 日），〈盧溝禦侮（二）〉，特交文電，《蔣檔》，典藏號：002-090105-00002-135。

事，不得要領。同時，日軍向上海增加海軍兵力。[55]

11 日，蔣中正聞知日本艦隊集中滬市，且有八大運輸艦到滬，預料「其必裝載陸軍來滬」，故「決心封鎖吳淞口」。[56] 當時國軍受制於淞滬停戰協定，上海市區內僅駐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所指揮之上海市保安總團（總團長吉章簡，轄第一、第二兩團及特務大隊）、上海市警察總隊及上海市保衛團（團長姜懷素，下轄第一、第二兩團）等部隊。京滬鐵路沿線有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所指揮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集結於吳縣、常熟、無錫一帶。11 日晚間，蔣中正「決心圍攻上海」。晚 9 時，統帥部電話命令張治中率領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向預定之圍攻線推進，準備對淞滬日軍圍攻，並命駐蚌埠之第五十六師、嘉興砲二旅之砲兵一團、在京之砲十團（新十五榴）之一營，開赴蘇州，歸張治中指揮。[57] 12 日，蔣復電令第三十六師提前開赴上海，限 14 日到達目的地，[58] 增強上海攻擊力量。

蔣中正雖決心圍攻上海，但仍顧慮外交，以為若主動開釁，難以對國際交代，故尚未確定上海開戰日期。8 月 12 日正午，張治中部署就緒後，即電蔣詢問可否於明晨開始攻擊？蔣傍晚急復電曰：「希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59] 是日蔣在日記記云：「對倭再作一次之討論。」[60]

---

5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257-261。

56 《蔣中正日記》，民國 26 年 8 月 11 日。

57 砲十團之一營及砲八團，原已在蘇、錫一帶。〈上海作戰日記〉（民國 26 年 8 月 11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頁 339。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 12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 —— 淞滬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 年再版），頁 6。

58 「蔣中正致蔣鼎文電」（民國 26 年 8 月 12 日），〈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革命文獻，《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09-019。

5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 341。

60 《蔣中正日記》，民國 26 年 8 月 12 日。

8 月 13 日，中日兩軍在上海前線擦槍走火，相互攻擊。究竟哪一方開第一槍，目前難以確證，但雙方統帥部皆未下令開戰。[61] 13 日夜間，中國統帥部始下達命令，於 14 日拂曉發動攻擊，空軍亦協同出戰。[62] 14 日國軍發動攻擊後，日本海軍亦決定開始正式作戰，「懲罰暴虐的支那」。15 日，日本編組上海派遣軍，以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轄第三師團、第十一師團。17 日，日本內閣決定放棄不擴大、局部解決之方針。[63]

8 月 16 日，蔣中正派軍事要員熊式輝、陳誠到上海視察，返還後熊報告「不能打」，陳則報告：「不是能不能打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打的問題。」「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二十五年所預定之戰略。」蔣中正乃謂：「打！打！一定打！」陳誠趁此機會建議：「若打，須向上海增兵。」隨後蔣發表陳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增調部隊，赴滬參戰。[64] 時日軍憑藉堅固工事抵抗，並於街巷沖水及以戰車阻塞路口，致國軍進展困難。[65] 國軍兵力逐漸增加，兵力雖較日軍為

---

61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262；「張治中呈蔣中正等電」（民國 26 年 8 月 13 日），〈盧溝禦侮（二）〉，《蔣檔》，典藏號：002-090105-00002-470；「張治中呈蔣中正電」（民國 26 年 8 月 13 日），〈盧溝禦侮（二）〉，《蔣檔》，典藏號：002-090105-00002-471；「張治中呈蔣中正等電」（民國 26 年 8 月 13 日），〈盧溝禦侮（二）〉，《蔣檔》，典藏號：002-090105-00002-472；〈上海作戰日記〉（民國 26 年 8 月 23 日），頁 410。

62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 16。

6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262-264。

6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53。

65 〈蔣總統來臺後批閱之「淞滬會戰經過與南京撤守」——民國 26 年 8 月至 12 月〉，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頁

多，但並未能以多打少，因為國軍準備並不充分，運輸遲滯，難以在短時間內一次集中兵力，形成優勢，包圍日軍，反而輪番上陣，前線部隊消耗到無法支持時，再調遣方抵達戰場的新部隊上前替換。[66]

8 月 20 日，中國劃江蘇南部及浙江為第三戰區，蔣中正兼任司令長官（最初任馮玉祥為司令長官，馮旋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23 日凌晨，日軍增援部隊 2 個師團於獅子林、石洞口、川沙口及張華濱附近，同時強行登陸，隨即向寶山、羅店、瀏河之線進攻。國軍因沿江配備兵力單薄，且後方交通不便，未能阻止日軍登陸，滬戰局勢遂益形擴大。24 日，陳誠指揮之第十五集團軍各部陸續到達，加入左翼，後來中央軍由朱紹良指揮，右翼軍由張發奎指揮，向登陸日軍猛攻，在羅店附近展開激戰。國軍士氣旺盛，但日軍以海軍砲火與陸空協同，威力極大，國軍犧牲過重，前仆不能後繼，日軍則增援不已，以致國軍僅能阻遏日軍之前進，解除側面威脅，難收聚殲之效。9 月初，日軍攻下吳淞、寶山，11 日，進據楊行，續向劉行進攻。[67]

9 月中旬，日軍再向上海增援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師團。於是日本在中國使用之兵力，在華北為 8 個師團，上海為 5 個師團，中央直轄 1 個師團，在日本本土之對華預備隊則有 3 個師團。人數方面，華北兵力約 37 萬人，上海方面約 19 萬人。[68]

9 月 14 日，陳誠親往劉行視察，見形勢岌岌可危，建議相機轉移陣地，保存戰力，以便步步為營，節節抵抗。蔣中正雖然核准，

227。

66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臺北：坤記印刷，1978 年第 4 版），頁 209-210。

67 《陳誠日記》，民國 26 年 8 月 23 日，國史館藏影像檔。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53-54；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64；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275-283。

6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294-300。

但又臨時令各部再守三天，再行轉移陣地。16 日，第九集團軍被迫撤至上海北車站、江灣、廟行、楊家宅之線固守。此時中國空軍因初期作戰損失過大，兼之補充困難，致上海戰場之制空權盡落日軍，國軍飛機只能夜間冒險出動轟炸。迄 9 月 30 日，國軍陣地屢遭突破，乃向蘊藻濱南岸陳行、廣福、施相公廟、瀏河之線轉移，全部攻勢即告無形停止。[69]

9 月底之前，淞滬戰事為國軍攻勢時期，其後為陣地戰時期。[70] 國軍自移到新陣地後，日軍增援部隊先後到滬，國軍方面亦陸續增援，湖南、廣東、廣西各省部隊均編入戰鬥序列；劉建緒部則到達右翼之滬杭路方面；川軍亦已東下運輸。10 月 12 日，日本參謀本部正式決定，將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方面。同時，日軍持續猛攻，集中火力企圖突破大場陣地，激戰至烈，國軍為恢復蘊藻濱南岸陣地，決行反攻。19 日夜，各部開始前進，適日軍主力亦向國軍進攻，當即展開大規模之遭遇戰。經三日夜之搏鬥，雙方傷亡均重，而國軍廣西部隊運輸不及，未能如期集中，影響戰局，國軍乃於 23 日退至小顧宅、大場、走馬塘、新涇橋、唐家橋之線。國軍陣地轉移後，日軍仍繼續猛攻大場，至 25 日，大場陣地大部被毀，陣線遂被突破。國軍上海方面守軍，因側背受到極大威脅，乃於 26 日撤至蘇州河南岸。陣地轉移後，蔣中正為鼓舞士氣，於 29 日親臨前線巡視並召集第三戰區將領面授機宜。[71]

國軍撤至蘇州河南岸時，團附謝晉元中校率領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的 1 個加強營據守北岸四行倉庫，日軍圍攻不下。期間，

---

69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54；〈蔣總統來臺後批閱之「淞滬會戰經過與南京撤守」——民國 26 年 8 月至 12 月〉，頁 227-228。

70 〈中日戰爭上海戰役回憶錄〉，《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91-001。

71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65-68；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54；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384。

女童軍楊惠敏由租界冒險到倉庫代表上海市民獻上大國旗，守軍即在砲火中將國旗升上四行倉庫屋頂，上海市民深受鼓舞。至 11 月 1 日拂曉，該部完整撤入上海公共租界。此一戰鬥激勵國軍士氣，並引起國際對中國抗戰之同情，該部遂被稱為「八百壯士」（實際約 400 人）。[72]

日軍為打開上海僵局，決定以第十軍的第六、第十八師團，於杭州灣登陸，第一一四師團繼之，側擊國軍。另由華北抽調第十六師團，在第十軍杭州灣登陸後，再登陸於長江上的白茆口。於是日本在華中成為 2 個軍 9 個師團，華北為 2 個軍 7 個師團，主戰場轉移至華中。[73]

11 月 5 日，日軍第六、第十八兩個師團，由杭州灣北岸之金公亭、金山咀等地同時登陸，時國軍調動防守此地之張發奎接替朱紹良為上海的中央軍總司令，此地遂無人負責，又國軍忽視側背之重要，僅注意浦東兵力不足，金山部隊大部移防浦東，故此

---

72 謝晉元率部撤往公共租界後，蔣中正正式編列孤軍團，所有官兵各晉一級，謝直升團長，仍率孤軍在孤軍營出操、上課、工作，並與上海租界內學生、工人、市民等互動。1941 年 4 月 24 日 5 時許，孤軍團官兵循例於操場集合，列隊早操，點名時有郝精神等 4 名士兵遲到 5 分鐘，遭謝當眾訓斥，該士兵早受人收買，遂在全體跑步時，乘謝不備，用短刀向其頭腰猛刺，謝當場死亡，團附上官志標中校見狀趨前救援，亦受重傷，兇手當場被孤軍捕獲，移解上海公共租界當局法辦，處以死刑及無期徒刑。孤軍團團長其後由上官志標遞升，迄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上海租界，孤軍團成為戰俘。上官百成編著，《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臺北：華欣文化中心，1976 年），頁 1-9、29-39；楊惠敏述，張力行記，《八百壯士與我》（臺北：博愛出版社，1970 年），頁 39-45。八百壯士實際上約 400 餘人，是時外籍記者通過租界守軍，送字條詢問謝晉元守軍人數，為避免日軍知曉守軍實際僅一營而加強進攻，遂報稱 800 人，此為「八百壯士」之由來。楊瑞符，〈孤軍奮鬥四日記〉，《正面戰場・淞滬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 年），頁 114-125；陳德松，〈殊死報國的四行孤軍〉，《正面戰場・淞滬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 126-130。

7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388-396。

地甚為空虛。[74]

日軍登陸後，浦東與楓涇國軍奉令夾擊登陸之敵，惟以部隊太差，日機活動，致連絡困難，行動遲緩，未克如期實施；日軍直向松江方面進迫，國軍因集結未畢即與日軍接觸，致被各個擊破。9 日松江被陷，淞滬陣地至此全陷入日軍大包圍圈中，蘇州河南岸之頹勢亦未能挽回，國軍因而施行全線撤退。[75] 同時，日本改組在上海的軍隊，編成華中方面軍（中支那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下轄上海派遣軍及第十軍，方面軍以獲得結束戰爭之契機為目的，欲殲滅上海附近國軍。[76]

日軍於杭州灣登陸之時，蔣中正曾電詢陳誠如何處置。陳答以：「急宜縮短陣線，蘇州河部隊應速轉進武進一帶之國防線中。」蔣經半小時之考慮，准照此辦理，但旋因此時九國公約國正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開會，蔣為爭取國際聲譽，令再支持三日。三日後再行撤退時，部隊秩序已亂，命令無法下達。是夜，日軍衝入第一軍胡宗南司令部，官兵死傷甚眾。9 日拂曉，胡徒步抵崑山，陳誠命往收集潰兵。第十九集團軍薛岳總部亦被日軍衝入，薛泅水連越三河，力疲不支，幾殆，賴獲一浮木得免。[77]11 月 19 日，日軍進至吳福線國防工事，國軍撤退。日軍繼續西進，突破錫澄線，攻占江陰要塞，逼近南京。[78]

是役國軍傷亡慘重。國軍使用兵力約達 70 餘萬，日軍使用兵力亦達 30 萬左右。日軍外線作戰，雖使用兵力不及國軍半數，但裝備優良，使國軍遭受龐大折損，所失至少為日軍一倍以上。尤

---

74 《蔣中正日記》，民國 26 年 11 月 20 日，「本周反省錄」。

75 《陳誠日記》，民國 26 年 11 月 5 日；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58；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68。

7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397-399。

77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58。

78 〈蔣總統來臺後批閱之「淞滬會戰經過與南京撤守」——民國 26 年 8 月至 12 月〉，頁 229-230。

其戰前積極整備之德式裝備中央軍，損失極為重大。會戰之初，國軍士氣旺盛，但因傷亡慘重，至蘇州河撤守之時，士氣一落千丈，幾至無法維持。此役亦暴露中國組織管理之落後，後勤部門欠缺支援前方大兵團作戰的能力，及將領能力不足。會戰中，前線官兵有幾個月不發餉，幾天得不到飲食，而傷病軍民輾轉道途，無法治療，觸目皆是。大軍轉移之時，沿途遺棄的糧秣、彈藥、武器、汽油等，亦隨處可見。對於將領無能，陳誠於日記謂：「此次戰事均因初期所用將領無能，致使戰局陷於被動不利，非獨京漢線然也。」「能指揮兩師以上之軍長，實不多也。」[79] 蔣中正云：「此次失敗最大之原因，乃在高級將領平時不學無術，戰時指揮無方也。」[80] 黨務政治方面，組織不健全，系統不清楚，各級因人設位而應負責者僅掛名而已，實際負責者則無名義，甚而令將領「有無異在敵國作戰，國家焉得不亡之感」。[81]

國軍在淞滬會戰，亦有所得。藉由投入龐大兵力，打破日軍速戰速決之企圖，使戰爭朝向長期化發展，且中國軍隊在上海此一世界性大城市抗戰，足以向世界宣傳；國軍在世人的心目中，也為之觀感一新。此外，蔣中正將大量中央精銳投入前線，使各軍系對於政府抗戰之決心，再無置疑餘地，亦激起全國民族主義情緒。可以說，中國真正全面統一的抗戰，自淞滬會戰開始；在軍事統一前提之下，才形成了全國政治的統一。再者，是役爭取物資內遷時間，東南及沿海人民亦大量西徙，遂造成大規模文化交流，西南、西北之文化水準，於無形中躍進，對配合長期抗戰，有所作用。[82]

---

79 《陳誠日記》，民國 26 年 9 月 30 日、10 月 14 日；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64-65。

80 《蔣中正日記》，民國 26 年 12 月 16 日。

81 《陳誠日記》，民國 26 年 8 月 28-29 日，9 月 20 日。

82 唯真（即劉斐），〈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2-3；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第四節　南京保衛戰

淞滬會戰結束前後，日本為使軍事部門與政府間經常保持密切聯繫協調，使政略、戰略得以一致，於 11 月 20 日設置大本營，即最高統帥部，其下分設陸軍部與海軍部。[83]

日本前線部隊，認為應乘國軍頹勢，一舉攻占南京。日本統帥部則認為，應將前線軍隊停止於蘇州、嘉興一線，使國民政府留在南京作為談判對象，再通過壓力使其屈服，因此於 11 月 20 日下令前線停止於原訂作戰線（制令線）範圍。惟受前線軍隊迫切要求之影響，日軍仍於 24 日廢除該線。[84]

日軍繼續西進，國軍由於未能及早後撤，以致籌建多年的吳福線、錫澄線國防工事悉數放棄。日軍前鋒直指首都南京，蔣中正召集幕僚，連日研商南京防守計畫。第一次會議有何應欽、白崇禧、徐永昌、劉斐等要員參加，軍事委員會第一部第一組（作戰組）組長劉斐認為淞滬會戰後期沒有貫徹持久消耗戰精神，未能適時調整戰線，保存有生力量，現在不應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爭勝負。日本以優勢的陸海空軍和重裝備，南京在其立體攻勢之下無法守住，且國軍在淞滬會戰損失過鉅，已無戰鬥力。由於南京是首都，不宜不做任何抵抗，可象徵性的防守後主動撤退。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支持此意見；蔣當下亦同意此說法。[85]

此際，蔣中正召陳誠入京，垂詢防守南京之策，陳答以：「如要我守，我遵命；不要我守，我有意見，願即陳明。我以為敵人

65-67。

83 森松俊夫，《大本営》（東京：教育社，1980 年），頁 189-201；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06-414。

8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16-419；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 503-506。

85 唯真，〈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頁 6。

在戰術上雖獲勝利，但在戰略上實已失敗。現在我軍應速脫離戰場，撤至皖南，以南京為前衛陣地，以貫徹我持久抗戰之目的。」蔣乃命陳與何應欽、白崇禧及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會商。咸以南京孤立，無現代要塞設備，不易堅守，反覆請命，至六次之多，蔣終於首肯，命陳誠前往皖南布置。[86]

第二次幕僚會議，出席者更多。訓練總監部總監唐生智認為南京是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繫，又是孫中山陵墓所在，非死守不可。蔣未做肯定表示，僅表示唐的意見值得考慮。[87]

第三次幕僚會議，唐生智仍堅持固守南京，蔣明確表態支持，詢問誰肯負責防守？會議一片沉寂，唐見無人作聲，慷慨陳詞，表示自抗戰以來中下級軍官犧牲甚多，卻未見高級軍官犧牲者，乃自願堅決死守，與南京共存亡。白崇禧視察前線歸來，深知淞滬撤下部隊殘缺不齊，疲憊萬分，本有意提議宣布南京為不設防之城市，但議席上見蔣中正已經表態，為免擾亂最高統帥之決心，建議案便未提出。於是棄守南京之議遂寢。[88]

11 月 20 日，唐生智出任首都衛戍司令長官，立即組織司令部，以第十軍徐源泉部、第六十六軍葉肇部、第八十三軍鄧龍光部、第七十四軍俞濟時部守衛南京外圍陣地，第三十六師宋希濂部、教導總隊桂永清部、第八十七師王敬久部、第八十八師孫元良部守衛南京附廓陣地，總兵力共約 11 萬人。[89]

12 月 1 日，日本決定攻占南京，第十軍於 3 日前後開始行動，

---

86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60。

87 唯真，〈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頁 6-7。

88 唯真，〈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頁 7；郭廷以校閱，賈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談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頁 149-155。

89 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頁 125-127。

上海派遣軍於 5 日前後行動。[90] 7 日拂曉，日軍向南京外圍陣地發動總攻擊，國軍誓死抵抗，終以火力不足，秣陵關、淳化鎮、湯山等地相繼陷落，日軍乃向南京腹部陣地進攻，雨花台、紫金山各要點先後失守。日軍突入南京中華門、光華門、中山門，發生巷戰。同時，日軍一部由當塗渡長江，經烏江鎮趨浦口，另一部由鎮江渡江趨江都。11 日，蔣中正電唐生智「如情況不能久持時，可相繼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12 日，唐以戰局無法挽回，下令放棄南京，分路突圍；惟原係破釜沈舟的死守，初無撤退計畫，故僅向東方突圍之第六十六軍安全轉移浙皖邊區，其餘傷亡慘重。13 日，日軍攻陷南京，縱兵放火、劫掠、屠殺、姦淫，是為南京大屠殺。[91]

南京陷落，中國野戰軍損失慘重，舉國震驚。日軍以為中國抗戰已至土崩瓦解之階段，而中國國內對日和談之聲浪高漲。蔣中正認為目前之形勢，無論如何艱難惡劣，唯有向前邁進，如果中途屈服，亦即自取滅亡；與其屈服而亡，永無復興之望，毋寧抗戰而敗，終必有轉敗為勝之時。乃於 12 月 16 日發表「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堅決表示抗戰到底。[92]

日本方面，在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調停失敗後，於 1938 年 1 月 16 日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象的聲明，同時開始籌畫對華持久作戰之準備。[93]

---

90 「南京攻略の経過概要」，〈南京攻略戦の概要〉（昭和 12 年 11 月 19 日 -12 年 12 月 12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1111744800。

9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三）》，頁 261；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70；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60。

92 《蔣中正日記》，民國 26 年 12 月 18 日，「本周反省錄」；12 月 27-29 日。蔣中正，〈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民國 26 年 12 月 16 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頁 248-250。

9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53-469。

第五節　徐州會戰

日本陸軍中央，自從中國事變之初，便抱持不擴大、速戰速決方針，及至攻占南京，已覺悟不得不準備長期持久戰，但仍擔憂蘇俄之動向，認為向中國繼續加派兵力，有其危險性。1938 年 2 月，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決定當前之作戰指導：確保中國現占地之安定，並為對中蘇兩國作戰完成軍事整備，對蘇尤應嚴加警戒；在狀況允許以前，不擴大戰面。[94]

日本在華之軍隊調整部署，1938 年 2 月 14 日，解除華中方面軍、上海派遣軍及第十軍之戰鬥序列，重新編組為華中派遣軍（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由畑俊六大將出任，下轄第三師團、第六師團、第九師團、第十三師團、第十八師團、第一〇一師團等 6 個師團。其任務為確保長江右岸地區各要點之安定，並打擊該地國軍。[95]

3 月 30 日，華北方面軍修改戰鬥序列，司令官仍為寺內壽一大將，下轄第一軍（第十四、第二十、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師團）、第二軍（第五、第十師團），方面軍直轄第十六、第一一四師團等，共有 8 個師團。其任務為確保膠濟沿線及濟南至黃河上游左岸一帶占領區之安定，以航空隊對中國要地續行攻擊，並盡力充實各部隊之戰力。此外，在對蘇的東北關東軍與對華之華北方面軍之間的蒙疆，設置駐蒙兵團，轄第二十六師團，負責內蒙、察南、晉北之安定。[96]

---

94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6 年），頁 1-6。

9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6-8。

96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8-9。

一、台兒莊大捷

日本華北方面軍第二軍西尾壽造部，於 1937 年 11 月 5 日發動攻勢，欲殲滅黃河北岸之山東軍。國軍黃河北岸陣地動搖，第三集團軍韓復榘部逐次向黃河南岸撤退，黃河鐵橋亦自行焚毀。日軍第二軍認為應乘勝渡河追擊，參謀本部當時以南京作戰及截斷中國補給路線為主，並顧慮可能發生的對蘇作戰，故限制華北前線之擴展。[97]

日軍攻占南京後，形勢大變，日本大本營欲平定自膠濟沿線至黃河左岸地區，下令華北方面軍發動攻擊，確保並安定占領地區。12 月 23 日，第二軍渡黃河南進。韓復榘於日軍渡河後，除留第二十師守濟南外，其餘部隊均撤至泰安。日軍追擊，26 日，攻占濟南，1938 年 1 月 1 日攻占泰安，11 日攻占濟寧。韓部撤至運河西岸，有開往漢中意圖。當韓在泰安時，中國統帥部令其依山構工，憑險固守，韓覆電云：「首都尚且不守，區區泰安如何守得著？」之後又屢次放棄陣地，統帥部責以守土有責，不可擅離職守，韓答以：「全面抗戰，何分彼此？」泰安既失，青島方面過於突出，只得隨之放棄。蔣中正為整飭紀綱，嚴明賞罰，翦除抗戰時內部之威脅，於 1 月 16 日藉開封召開軍事會議誘捕韓復榘，解其至漢口受軍法審判，最後未公開判決，於 24 日將其亂槍打死。韓死後，國民政府任于學忠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未到任），孫桐萱為副總司令代總司令，並將津浦線劃為第五戰區，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98]

1938 年 2 月，日本參謀本部考慮到可能被國軍所誘而不知不覺擴大戰面，進而牽制大量兵力，妨害全盤整頓，要求華北方面

---

9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頁 438-440。

98 張霈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 年），頁 130-133；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51；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90-91。

軍不得超越黃河之線作戰。然而，在前線的第二軍，獲得國軍兵力增加、即將發動反攻之情報，請求驅逐當前國軍，並表示此南進並非深入作戰，大本營終於允許南下掃蕩。第二軍遂於 3 月 13 日令磯谷廉介中將指揮的第十師團擊滅大運河以北國軍，板垣征四郎中將指揮之第五師團以一部占領沂州進入嶧縣附近，與第十師團協同作戰。[99]

日軍當面之中國第五戰區下轄部隊，被稱為「雜牌部隊」，兵額不足，訓練與士氣欠缺。惟抗日戰爭以前，因內戰頻繁，各級幹部的戰陣經驗極為豐富。將領激於民族主義，有與日軍一拚之鬥志，然對中央隔膜，顧慮部隊作戰損失之後，不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員補充，甚而遭申斥作戰不力，撤職查辦，撤銷部隊番號，如此便無以謀生，因此懷著沉重惶惑的心情。[100]

南京失陷後，津浦路南段直至浦口，完全空虛，無兵防守。第五戰區即將原駐海州的桂軍第三十一軍劉士毅部調至津浦路南段滁州、明光一帶，作縱深配備，據險防守，游擊戰術與正規戰術配合運用。明光以南，為湖沼和小山交錯地區，易於防守，日軍的機械化部隊不易發揮威力。日軍自鎮江、南京、蕪湖三地渡江北進，為國軍所堵截，遂自南京調集援軍及戰車、野砲等重武器進攻。第五戰區命令前線軍隊自明光西撤，將津浦路正面讓開，同時將原守青島的于學忠第五十一軍南調，布防於淮河北岸，憑險拒敵越河北進。日軍向明光前進，未捕捉國軍主力，嗣後連下定遠、懷遠、蚌埠，然為國軍阻於淮河南岸。此時西撤的第三十一軍自日軍左側背向東出擊，將津浦路截成數段。淮河前線日軍，因後路被斷，乃迅速將主力南撤，沿津浦路與第三十一軍展開拉鋸戰，津浦南段戰事乃形成膠著、隔淮對峙之局。[101]

---

99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24-31。

100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 年），頁 689-690。

101 郭廷以校閱，沈雲龍訪問，陳三井、馬天綱紀錄，〈劉士毅先生訪問紀錄〉，《口

津浦路北段方面，3 月中旬，由青島方面西進之日軍第五師團進迫臨沂，與津浦正面日軍第十師團分進合擊。國軍調集大軍分頭抵抗，第三軍團龐炳勳部及第二十七軍團張自忠部與日軍第五師團坂本支隊（坂本順少將指揮，轄步兵第十一聯隊、步兵第二十一聯隊、步兵第四十二聯隊一大隊、野戰砲兵第五聯隊等部）激戰於臨沂附近，成功守住臨沂，造成台兒莊戰役序幕戰之勝利。第二十軍團湯恩伯部之第八十五軍王仲廉部及第五十二軍關麟徵部，向津浦正面進擊，第十二軍孫桐萱部由魯西向兗州側擊，策應正面之作戰，惟日軍攻勢強硬，滕縣、官橋、嶧縣及韓莊等據點，先後淪陷。[102]

日軍進據韓莊後，第十師團瀨谷支隊（瀨谷啓少將指揮，轄第三十三旅團司令部、步兵第十聯隊、步兵第六十三聯隊，機槍、裝甲車、砲兵等部隊）續經台棗支線（台兒莊至棗莊之鐵路）南下，沿途攻擊國軍，3 月 23 日，日軍到達台兒莊北泥溝車站，徐州城內已聞砲聲。24 日，日軍開始猛烈砲轟國軍防禦工事，戰鬥激烈，期間，第二集團軍孫連仲陣地每日落砲彈至 6、7 千發之多。砲轟之後，日軍以戰車為前導，向國軍猛衝，將台兒莊周邊陣地工事摧毀，日本步兵再躍入據守，步步向前推進。台兒莊一帶盛產石塊，居民多疊石為牆，以故每一住宅皆係一堡壘。此種石牆被日軍衝入占據之後，國軍因無平射炮，又無戰車，即無法反攻。然國軍士氣旺盛，激烈搏鬥，至死不退。日軍猛攻三晝夜，方衝入台兒莊城內，與國軍發生激烈巷戰。孫連仲部傷亡過半，漸有不支之勢。李宗仁嚴令孫死守待援。[103]

自 3 月 24 日迄 4 月 3 日，日本第十師團瀨谷支隊主力已全

述歷史》，第 8 期（1996 年 12 月），頁 98-100；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692-694。

102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68-69；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705。

103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715；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71。

被吸引於台兒莊附近，中日雙方展開猛烈爭奪戰。日軍以野砲 67 門、重砲 10 餘門、戰車 30 餘輛，四面圍攻。孫連仲部池峰城之第三十一師困在核心，持續奮戰，誓與台兒莊共存亡；台兒莊之城塞被攻占四分之三，守軍仍屹然未動。[104]

當台兒莊守軍苦戰待援之際，湯恩伯第二十軍團即展開對日軍瀨谷支隊之反包圍，隨即發動總攻。日軍腹背受敵，情況危殆，乃令臨沂方面第五師團坂本支隊放棄臨沂之攻擊，星夜轉用，進攻湯恩伯部之側背，企圖解瀨谷支隊之圍。惟該部遭湯部分兵打擊，湯部並回師力攻被圍日軍。至 4 月 6 日晚，日軍瀨谷支隊，決定撤退，國軍追擊。撤退日軍進入嶧縣附近之獐山、九山及稅郭等堅固據點，傷亡甚大，極力整頓，第五師團陣亡 1,281 人，負傷 5,478 人；第十師團陣亡 1,088 人，負傷 4,137 人，兩部傷亡共約 1 萬 2 千人。[105]

是役被中方稱作「台兒莊大捷」，捷報傳出之後，舉國若狂。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以非中央嫡系的桂系出身，統帥「雜牌軍」組成的部隊，統合得當，對各軍量力而用，上下一心，並對敵情判斷正確，擊其所短，知己知彼，充分發揮內線作戰之效能。[106] 日軍雖不承認此役戰敗，當時各部也無挫敗感，然的確遭受相當損失。[107]

---

104 國史館史料處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各重要戰役史料彙編——台兒莊會戰》（臺北：國史館，1984 年），頁 186-188。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71。

10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31-42；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東京：芙蓉書房，1978 年），頁 204-208；王仲廉口述，黃潤生執筆，〈臺兒莊血戰記〉，《中外雜誌》，第 43 卷 4 期（總第 254 期）（1988 年 4 月），頁 26-29。

106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718-722。

107 户部良一著，趙星花譯，〈華中日軍：1938~1941——以第 11 軍的作戰為中心〉，頁 259。

二、徐州撤守

當台兒莊戰役進行之時，日軍偵得國軍大量集結於徐州附近，尤其中央嫡系第二十軍團湯恩伯部的出現，使日軍認為此乃予國軍主力一大打擊，以挫折中國抗戰意志之大好機會，且國軍宣傳台兒莊大捷，恐有助於國內團結及促使列強援助，遂改變戰面不擴大方針，實施徐州會戰。4 月，日本大本營發布擊破徐州附近國軍之命令，以華北方面軍派遣第二軍由北往南，在徐州附近及津浦線以東吸引國軍兵力，再從徐州西方、西南方包圍截斷其退路，然後攻擊徐州，一舉殲滅國軍。另以第一軍約 1 個師團從蘭封東北向歸德國軍退路攻擊，而華中派遣軍從南方沿津浦路策應華北方面軍作戰，亦求截斷國軍退路。戰爭過程區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準備作戰階段，以第二軍及華中派遣軍抑留、牽制國軍。第二階段為攻擊階段，由第二軍發動急襲，華中派遣軍協同包圍徐州，殲滅國軍；另以一部攻擊蘭封等地，遮斷隴海線西部交通。第三期為鞏固占領地和追擊作戰階段，鞏固徐州及其周邊，並視情況攻擊開封及鄭州等要地。[108]

時中方亦調大批援軍支援徐州，周嵒的第七十五軍、李仙洲的第九十二軍、樊崧甫的第四十六軍、盧漢的第六十軍、李延年的第二軍和晉軍商震部的一師、譚道源的第二十二軍等部先後到徐，加強徐州及附近地域之防線。不到一個月，中國援軍抵徐幾達 20 萬人，與第五戰區原有軍隊合計不下 60 萬，大半聚集於徐州附近地區，中央並續調大軍增援。蔣中正為首的中國軍事首長主張與日軍持久消耗，並派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及軍令部次長林蔚、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等到徐州籌畫防禦。

5 月初，日軍發動總攻，5 月中，日軍迫近徐州，射擊野砲入

10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43-52；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頁 539-542。

城，第五戰區長官部數次中彈起火。國軍以後路被斷，徐州遭圍，為避免更為不利之態勢，全軍向徐州西南全面撤退，為避免日機轟炸，多數部隊晝息夜行。日軍旋即南北會師，惟陣容不無混亂，且因地形不熟，不敢夜間外出堵截，加以地形廣闊，兵力不敷，國軍未脫離包圍圈的部隊，亦自日軍間隙安全通過。

日軍於徐州會戰占領徐州等城市，並打通津浦路，聯繫南北戰場，卻無法澈底擊潰國軍主力，未達殲滅國軍之作戰目標。[109]

三、隴海路戰事及花園口決堤

5 月中旬，日本華北方面軍第一軍，派遣土肥原賢二中將指揮之第十四師團渡過黃河，向南進入蘭封附近，中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以第十七軍團胡宗南、第七十一軍宋希濂、第二十七軍桂永清、第六十四軍李漢魂、第三十九軍劉和鼎等部予以拒止。24 日晨，日軍乘宋希濂部換防之際，乘隙進擊，攻下蘭封，其後卻遭到國軍包圍攻擊，陷入苦戰。同時，徐州會戰結束以後，華北方面軍追擊國軍，第二軍命第五師團及第一一四師團向津浦線徐州、宿縣間追擊，第十六師團攻略歸德，第十師團向永城方向急進。國軍以薛岳任豫東兵團總指揮，統率第七十四軍俞濟時部、第八軍黃杰部、第六十四軍李漢魂部等 3 個軍，迎擊當面日軍，發生激烈戰鬥。日軍攻勢猛烈，24 日攻占碭山。27 日，守歸德之國軍第八軍黃杰部 1 個師擅自撤退，以致日軍趁隙突入，28 日，日軍占領歸德。程潛為避免與日軍在豫東平地決戰，乃決定各軍西撤平漢路以西。日本第一軍以第十四師團正在激戰，建議方面軍應擊滅開封、鄭州附近之國軍，摧毀國軍之抗戰意志。於是華北方面軍下令第二軍進入開封東南地區，並得相機以部分兵力占領開封，惟無意攻下鄭州。6 月 6 日，日軍沿著隴海鐵路攻下開封，

109 徐州會戰過程，參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徐州會戰（一）》，頁 19-72。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頁 724-731。

7 日攻下中牟，持續西進，爆破鄭州南方之平漢鐵路、橋樑。國軍大部撤至平漢線以西。華北方面軍見戰況極為順利，下令隴海沿線作戰兵團逐次集結於開封、杞縣、亳縣、宿縣附近之線，準備下一期之作戰。[110]

日軍沿隴海路西進，快速逼近鄭州，中方懼日軍攻占鄭州後，將沿平漢鐵路迅速南下奪取武漢，蔣中正遂令程潛破壞黃河大堤以阻滯日軍。6 月 9 日，國軍於花園口炸堤成功，黃河氾濫。蔣即以密電致程潛，令其向民眾宣傳黃河大堤為日機炸毀，中國各報隨即於 12 日以後報導日機轟炸造成決口情事。[111] 黃河潰決，洪氾區日軍受困，各軍趕忙支援工兵及補給品，並以飛機空投物資，漸次東退至洪氾區之外。[112]

花園口決堤後黃河氾濫數年，豫東、皖北和蘇北的民眾犧牲慘重，影響總面積約 3 萬平方公里，實際受災面積約 1 萬 3 千至 1 萬 5 千平方公里，受災民眾約 1,250 萬人，逃亡約 390 萬人，死亡約 89 萬人，淹沒耕地 1,993.4 萬畝，[113] 這樣的傷亡與損失，超過八年抗戰任何一場單一會戰。國軍所以炸堤，乃認為日軍將沿平漢線由北往南進攻武漢，為使日軍改為藉長江由東向西仰攻，國軍方能節節抵抗，持久抗戰，不得不炸堤以改變日軍進攻路線。

---

11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65-68、73-77；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98-99；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 年），頁 173-174。

11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鄭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鄭州文史資料》，第 2 輯：黃河花園口堀堵專輯（鄭州：編者印行，1986 年），頁 25-32。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頁 146-147；「程潛呈蔣中正電」（民國 27 年 6 月 10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七年（三）〉，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283-022；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pp. 157-164.

112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77-78。

113 渠長根，《功罪千秋——花園口事件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52-253。

學者對此舉之功過意見分歧，肯定者認為決堤拖延日軍進攻武漢，為國軍爭取寶貴時間，雖人民犧牲慘重，但這是不得不採取的措施。[114] 反對者指出日軍兵力不足，本來便認為由平漢路南進所受阻力太大，而不採取此一路線，[115] 且日軍畢竟在 10 月下旬依然占領武漢，黃河不決口，日軍也未必能提前三、四個月到達武漢，又開封至武漢之間，有潁河、汝河、淮河等河川，還有桐柏山、大別山等山地，若國軍能節節抵抗，日軍當不至於長驅直入。若能不決堤造成上千萬民眾受災，反而將他們組織起來進行游擊戰爭，對抗戰或許更為有利。[116]

第六節　武漢會戰

武漢當平漢、粵漢兩鐵路之交，長江、漢水之會，為中國東西南北交通樞紐，南北戰場之聯繫，戰略地位重要，且為國軍失守南京後的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不啻為事實上的首都。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攻克南京之後，曾進行攻略漢口、廣東之研究，該研究雖在 1938 年初以「戰面不擴大方針」而終止，但在徐州會戰爆發之後，此研究再度展開，欲以攻略武漢，結束戰爭。6 月 10 日，日本設立由總理、外務、大藏、陸軍、海軍等大臣組成

---

114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 年），頁 447；國民革命建軍史編纂委員會編，《國民革命建軍史》，第三部：八年抗戰與戡亂（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 年），頁 864-865、882-883；Hans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9*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Curzon, 2003), p. 226.

115 田照林，〈正面戰場作戰史料的選用——兼論花園口決堤對抗日戰爭的影響〉，《軍事歷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頁 97-100；馬仲廉，〈花園口決堤的軍事意義〉，《抗日戰爭研究》，1999 年第 4 期，頁 203-213；郭汝瑰、黃玉章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750-752；Diana Larry, “Drowned Earth: The Strategic Breaching of the Yellow River Dyke, 1938,” *War in History* 8:2 (2001), pp. 191-207.

116 黎東方，《細說抗戰》（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 年），頁 150。

的五相會議，議定「集中國力，以概在本年內達成戰爭目的為前提」。15 日，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中，正式決定實施漢口攻略作戰。日軍估計此戰需要兵力約 40 萬，其中新增兵員共 24 萬，需籌措戰費 32 億 5,000 萬日圓。[117]

日軍原先計畫以 1 個軍沿平漢線南下，及以 1 個軍沿長江西上進攻兩案，後來考量到平漢線作戰所需兵力過大，而此時華北「治安不良」難以抽調兵力，故終止前案，決定以 1 個軍沿淮河進攻大別山系北方地區，另以 1 個軍沿長江進攻。此案除可節省兵力，亦有統一由華中派遣軍作戰指揮之優點。5 月底，大本營策定華中派遣軍於 6 月中、下旬在長江方面占領安慶，淮河方面占領壽縣、正陽關、六安附近，以備爾後之作戰。6 月中旬，因國軍於花園口破壞黃河大堤，黃河潰決，奪淮入海，日軍認為利用淮河水運將有困難，乃決定主力沿長江一路前進，另一路以大別山北麓向西作為助攻。6 月 18 日，日本大本營發布命令，指示以初秋為期，攻略漢口。[118]

中國方面，5 月 31 日，蔣中正對於徐州會戰後日軍之動態進行評估：「敵將先攻洛陽，打通隴海路，再由西安荊紫關公路直搗襄樊，截斷宜荊，包圍武漢乎？此應特別注意。」[119] 蔣是時之估計，與日軍計畫並不相合，但已預見日軍將進犯武漢。其對日軍進攻武漢之時間點，亦有所評估：「八月以前雨季水漲，敵或不敢急攻武漢，故我應即時整理內部，增強實力，待時乘機，再圖反攻。」[120] 該預測頗為準確，日軍的確不於 8 月以前實施攻擊，而在 8 月底發動總攻。此際，蔣獲報日軍有攻擊華南之意圖，乃

---

117 秦郁彦編，《日本官僚制総合事典：1868-2000》（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 年），頁 18-19；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84-90。

11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109-110。

119 葉健青編，《事略稿本》，第 41 冊（臺北：國史館，2010 年），頁 575。

120 葉健青編，《事略稿本》，第 41 冊，頁 608。

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防範。此情報亦頗為準確，日軍的確有意在攻略漢口時，繼之奪取廣州。

日軍發動總攻前，已沿長江西上，步步占領據點。1938 年 6 月 12 日，日軍先以陸海軍攻安慶，打通合肥、安慶公路，並進占潛山、太湖。23 日，以波田支隊（波田重一少將指揮，轄臺灣步兵第一、第二聯隊、臺灣山砲聯隊等部），在海空軍掩護下進攻馬當，26 日攻陷；7 月 2 日，又進攻湖口，5 日進占。日軍在該兩處均使用毒氣攻擊。[121] 7 月 21 日至 31 日，發生姑塘、九江、小池口戰鬥，國軍持續敗退。[122]

就在中日武漢正式交鋒之際，日蘇間爆發張鼓峰事件。日本自日俄戰爭（1904-1905）以來，以俄國為頭號假想敵，極為重視日俄（蘇）關係。張鼓峰事件為日本、滿洲與蘇俄的邊境衝突。7 月 9 日，位在滿洲國國境東南端的張鼓峰，有十數名蘇軍士兵進入，並陸續增加兵力構築陣地。此地由日本朝鮮軍第十九師團負責守備，朝鮮軍接獲情報後，向中央提出「首先進行外交談判，若對方不理會，則以實力驅逐」的建議。日本大本營為使外交交涉有相當後盾，並預防緊急情況，於 16 日命令朝鮮軍「因應需要得將部隊集結在國境附近，但行使武力必須等待命令」。於是第十九師團尾高龜藏中將率部於 20 日前後集結在國境附近。29 日，蘇軍再度「越境」構築工事，尾高師團長接獲報告，採取斷然處置，逕令所部驅逐蘇軍。31 日，日軍占領張鼓峰。蘇軍隨即於次日在空軍、砲兵支援下猛烈反擊，但為日軍擊退。日本大本營雖堅持不擴大方針，但朝鮮軍司令官仍認可下級增強兵力之建議。8 月 6 日至 10 日，蘇軍再度發動攻勢，仍為日軍擊退。日本關東軍見情況益趨嚴重，自動將下轄師團向國境推進，以為增援；大本營亦將部署於南滿的直轄第一〇四師團推進到琿春，以牽制蘇俄

121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04。

122 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劉鳳翰，《抗日戰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年），頁 353-354。

遠東軍。[123]

日蘇衝突，引起中方密切注意。蔣中正深知日蘇矛盾，在全面抗戰前，便有日蘇先戰之想。[124] 其後雖無法如願，仍對日蘇爆發戰爭充滿期待。隨著張鼓峰事件日蘇戰事愈發激烈，蔣益為期待日蘇大戰，[125] 政府要員亦認為這就是期盼已久的日俄戰爭。[126] 然而，在日蘇皆不欲擴大戰事的情況下，雙方於 8 月 10 日夜 12 時在莫斯科簽訂停戰協定。11 日中午，日蘇停戰，事件結束。[127]

日本大本營於 1938 年 8 月 22 日，下達命令，發動漢口攻略作戰，中方稱武漢會戰。此役為七七事變以來，日軍動員人數最多之戰役。是時日本全國兵力共 34 個師團，6 個獨立混成旅團，約 90 萬人，除去日本本土、朝鮮各留 1 個師團，臺灣留半個獨立混成旅團，派至中國戰區者（包含東北）達 32 個師團，5 個半混成旅團，約 82 萬 5,000 人，占總兵力之 91.7%。此次參與漢口攻略作戰之主力，為華中派遣軍 40 餘萬人，約為日本派遣至中國戰區作戰兵力之一半。總司令畑俊六大將，編有 2 個軍。東久邇宮稔彥王中將指揮第二軍，下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 4 個師團，約 12 萬人。岡村寧次中將指揮第十一軍，下轄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等 5 個師團，約 15 萬人。直轄部隊（含騎兵旅團、陸海軍航空隊、海軍第三艦隊等）第

---

12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134-135；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關東軍〈1〉対ソ戦備・ノモソハソ事件》（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 年），頁 337-413。

124 蔣中正，〈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對日言論選集》（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4 年），頁 286-306；黃自進，〈「安內攘外」的另一章：蔣介石對「日蘇先戰」的期盼〉，黃自進編，《蔣中正與近代中日關係》，上冊（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 年），頁 123-170。

125 蘇聖雄，〈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決策〉，國防大學編，《國防大學慶祝建國 100 年「抗日戰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防大學，2011 年），頁 106-111。

126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頁 219-220。

127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135。

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一一六等師團及波田支隊，約 14 萬人。[128]

國軍方面，是時全國兵力共 210 個步兵師，35 個步兵旅，11 個騎兵師，6 個騎兵旅，10 個砲兵團，8 個砲兵營和其他特種部隊。參與武漢會戰者為第五、第九戰區。長江以北、淮河以南之皖豫鄂三省由第五戰區負責，司令長官李宗仁，下轄 2 個兵團，24 個軍，50 個師，1 個步兵旅，1 個騎兵旅，兵力約 28 萬人。長江南岸之皖贛鄂湘四省，由 6 月 14 日成立之第九戰區負責，司令長官陳誠（兼武漢衛戍總司令），下轄 2 個兵團，26 個軍，70 個師又 1 個稅警旅，及江防要塞、保安隊、游擊隊等，總數約 38 萬人。總計武漢會戰動員軍隊，超過全國總兵力之一半。[129]

日軍發動攻擊後，長江方面戰事，由於日軍每一攻擊箭頭所指，可能是某一處，也可能是某幾處，國軍的守勢戰略備多力分。在失去九江前後，國軍控制於前方之部隊約 20 個師，而同時間日

---

12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108、114-116、136-139；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頁 323-324、326、334-342。

129 7 月中旬李宗仁因宿疾復發，戰區司令長官由白崇禧暫代。郭廷以校閱，賈廷詩等訪問、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頁 185-186。9 月 20 日武漢衛戍總司令部直屬大本營，陳誠免兼總司令，由副司令萬耀煌兼，其後又由郭懺代理。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頁 342-347；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76；張發奎，〈武漢會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 38 冊，總 112 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 年），頁 28；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下冊（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 年），頁 88。軍隊總數主要參考劉鳳翰的研究，另有數據指出 1938 年 6 月上旬中日總參戰人數各為 1,199,356 及 403,200，此數據直接以編制數乘上師（團）數，一來無法掌握確切之單位狀態（如部分單位被分割，或師級以下之直屬單位無法計入），一來國軍大多單位並非滿編，故暫不採用此一數據。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武漢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再版），第四篇第十三章第一節插表第六。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二）初期戰役》，下冊（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 年），頁 128。

軍使用之部隊僅 1 個多師團，由於國軍任一接觸面兵力皆不占優勢，且裝備、訓練顯居劣勢，制空權完全操諸日軍，故國軍以十敵一仍無法戰勝，於戰場屈居下風。[130] 馬當、田家鎮為中國沿江重要要塞， 6 月，馬當失陷，9 月中以後，日軍猛攻田家鎮。國軍於田家鎮配置重兵，守軍冒日機、艦砲之砲轟及毒氣之攻擊，苦戰兼旬，至 9 月 25 日失守。日軍續進，至 10 月 25 日已到達漢口近郊。[131]

大別山北麓戰事，日軍於 8 月 28 日猛攻六安、霍山，復進攻潢川、商城，使用毒氣，致國軍損害頗多，退守大別山既設陣地。9 月下旬，大別山北麓日軍與第十七軍團胡宗南部在信陽以東發生激戰，胡軍損傷甚重，信陽乃於 10 月 12 日晚失守，日軍即轉兵南下，企圖進入武勝關以西，截斷襄花公路。[132]

蔣中正對武漢會戰之戰術指導，主要有二：一為於江岸配置重砲，「腰擊」（從敵軍中段阻擊）日軍，並施放水雷，使日軍長江交通給養受阻，陸上部隊接濟斷絕，進退維谷。[133] 二為當日軍孤軍深入之際，捕捉戰機，斷其歸路，聚而殲之。[134] 前者的確對日軍造成阻礙，8 月底日軍攻擊馬頭鎮，海軍水路作業便受到該地附近之國軍砲擊而中止。[135] 然中國江防無海軍，專靠要塞砲火抵禦日艦，猶如抵禦空襲專靠高射機槍，效力不大，[136] 且運砲公路因先前國軍焦土作戰，澈底破壞，當時人手不足，重新修築頗為費時。[137] 至於施放水雷，日軍藉由「水老鼠」（即所謂「漢奸」）

---

130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85-86。

131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86-87；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06。

132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06-107。

133 蕭李居編，《事略稿本》，第 42 冊，頁 150、162。

134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86。

135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154。

136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86。

137 「顧祝同呈蔣中正電」（民國 27 年 9 月 2 日），〈領袖指示補編（十三）〉，

的協助，掃盡了國軍在長江與鄱陽湖布下的水雷。因此，日軍並不以受到國軍江岸砲擊或施放水雷而停止攻勢，雖受一定阻礙，仍不斷向前。[138] 關於後者，日軍機動性強，行動飄忽，國軍又無法控制機動部隊機動使用，所以雖遇良好戰機，往往當面放過。惟萬家嶺一役，國軍終於獲得機會。萬家嶺是介於瑞武公路與南潯鐵路之間的一個據點。10 月 1 日，日軍第一〇六師團第一三六旅團由何家山進抵萬家嶺附近，遭國軍抵抗，不能前進。日軍陸續增援，向國軍猛攻，發生激戰。日軍不支，紛向後方撤退，國軍增援予以各個包圍，雙方纏鬥甚烈。日軍退路被截斷，僅賴飛機投送給養。國軍第一兵團為澈底殲滅該敵，抽調部隊加入圍殲。至 10 月 10 日中國國慶日，戰事結束，日軍傷亡甚多，中方稱萬家嶺大捷，為台兒莊大捷之後，又一次重大勝利。[139]

圖 2　國軍俘獲之日本俘虜（國史館提供）

特交文電，《蔣檔》，典藏號：002-090106-00013-223。

138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紀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260。

139 何智霖編，《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頁 86。

圖 3　國軍俘獲之日軍護身符（國史館提供）

日軍在計畫漢口攻略作戰之時，便曾考慮同時進行廣州攻略作戰，但因海運不足等原因，決定在漢口攻略後再行實施。7 月，漢口攻略準備期間，已可調配廣州作戰之海軍資材，日本大本營遂決定實施廣州攻略作戰。9 月中旬，執行作戰的第二十一軍編成（轄 3 個師團），由臺灣軍司令官古莊幹郎中將擔任司令官。19 日，大本營發布廣州攻略作戰攻擊命令。[140]

為發動廣州攻略作戰，日軍動員 3 個師團及直屬部隊，加計

140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支那事変陸軍作戦〈2〉昭和十四年九月まで》，頁 219-225。

海軍，共約 7 萬 5000 人。[141] 國軍在廣州附近的兵力，以廣東綏靖公署主任、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部為主力，下轄 3 軍 7 師 2 獨立旅。[142] 對於日軍欲進攻廣東，國軍早已收到相關情資，而有所注意、防備。然則9月以來武漢方面戰況激烈，前方士兵急待補充，廣東軍隊遂不斷輸送武漢前線，在地防務也漸受忽視。[143]

10 月 12 日，日軍在廣東大亞灣附近強行登陸，中國守備部隊兵力薄弱，無法拒止，國軍水陸交通俱遭破壞，部隊集中困難，日軍遂於 10 月 21 日攻占廣州。[144] 國軍敗退過速，余漢謀及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遂遭人責難，謂為「鐵城無城，漢謀無謀」。[145]

日軍登陸廣東，令國軍腹背受敵，惟多數高級將領認為尚能撐持，蔣中正則獨排眾議，下令撤守武漢，[146] 國軍遂全面撤退。10 月 25 日，日軍攻占武漢。31 日，蔣中正發表「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申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期激勵中國軍民之士氣，持續抗戰到底。[147] 日方雖奪得武漢重鎮，戰勝國軍，舉國歡騰，但藉由攻略武漢以結束戰爭之希望，已然落空。此役反而使日軍更為深入中國腹地，陷入進退維谷、攻守兩難之境地。[148]

---

141 劉鳳翰，〈武漢保衛戰研究〉，頁 374。

142 此為日軍登陸廣東前夕的狀況，不含括支援武漢戰場的兩個軍。三軍大學戰史編纂委員會，《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二）初期戰役》，下冊，頁 197；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閩粵邊區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再版），頁 37-46。

143 葉健青編，《事略稿本》，第 41 冊，頁 609；蕭李居編，《事略稿本》，第 42 冊，頁 277、331、375。「蔣介石致余漢謀手令」（民國 27 年 10 月 10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 821。

144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09。

145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及紀錄，鄭義翻譯及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頁 27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民國 27 年 10 月 21、22 日，頁 407-408。

146 蘇聖雄，〈論蔣委員長於武漢會戰之決策〉，頁 130-132。

147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107。

148 蕭李居編，《事略稿本》，第 42 冊，頁 730。

發行人：呂芳上
主　編：呂芳上
顧　問：張　力
編　輯：許瑞浩、蘇聖雄

出版機關：國史館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 2 號
電話：（02）2316-1000
網址：http://www.drnh.gov.tw
郵撥帳號：15195213

贊助單位：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
　　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美編設計：邱元昌
排版印刷：捷騰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8 號 5 樓
電話：（02）2368-5353

初版一刷：2015年 7 月
定價：新臺幣 4,000 元（全套六冊不分售）
ISBN：978-986-04-4938-9　（精裝）
GPN：1010400984（套書）
　　1010400990（本冊）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史館秘書處秘書科
電話：（02）2316-1062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New History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貳 軍事作戰
On the Battlefield

展售處

國史館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 2 號
電話：（02）2316-1071
網址：http://www.drnh.gov.tw

世界大同文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15 號 2 樓
電話：（02）2357-5890
網址：http://www.agcmt-creation.com.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02）2518-0207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發行中心）
地址：臺中市中區中山路 6 號
電話：（04）2226-033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
呂芳上主編. -- 初版.-- 臺北市：國史館,
2015.07　冊；　公分
ISBN　978-986-04-4938-9（全套:精裝）
1.中日戰爭
628.5　104011101

70th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